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

李 政 云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土耳其 2001 年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签署国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深化学位结构改革,实现学位结构的进一步对等;启动伊拉斯莫项目及与其他国家签订高等教育双边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人员流动与相关资格文凭的互认;制定“高等院校学术评估与质量发展”框架,建立全国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改革高校招生机制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服务,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出台《终身学习战略文件与行动计划》,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等等。在改革进程中,土耳其一方面继续其等级制的管理传统,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同时开始重视通过组织结构的设置以协调各方的利益表达。

关键词: 土耳其; 高等教育改革; 博洛尼亚进程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2)07-0104-06

Research on Turkey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Bologna Process

LI Zheng-yu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ince becoming a signatory country of Bologna Process, a series of reform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Turkey higher education. First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degree structures to realize its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econdly, launching Erasmus Programme and signing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to strengthen personnel mobility and diploma recognition; thirdly, laying out the frame of Academic Assessment and Quali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urthly, reforming admission mechanisms and providing adequate student services to increase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fifthly, unveiling Lifelong Learning Strategy Document and Strategy Action Pla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learning. During the reform process, Turkey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of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hose characteristic is up-to-down; on the other hand, it begins to take attention to stakeholders' opinions through some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

Key words: Turkey;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Bologna Process

※收稿日期:2012-06-20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项目(09XGG19)

作者简介:李政云(1976—),女,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随着 21 世纪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越来越意识到以国际眼光重构本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为在国际高等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协调与其它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和提高本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土耳其于 2001 年签署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国。

欧洲高等教育区中,土耳其处于最东端,拥有该区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2001 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土耳其高校数量和招生人数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截至 2009 年底,土耳其各类高教机构达 152 所,其中公立大学(包括高等技术学院)94 所、基金会大学亦即私立大学 45 所,其它高等教育机构 13 所^①。^[1]注册一级学位(包括副学士学位)和二级学位的学生人数也从 2001 年的 1573281 人增长至 2009 年 2867673 人。^[2]土耳其根据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内容等着手加快本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一、博洛尼亚进程中土耳其高等教育的主要改革

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签署国之后,土耳其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主要对其学位结构、流动性与互认、质量保证、社会维度、终身学习等方面的改革予以介绍。

1. 学位结构的对等

1982 年以来,除牙医、医学、药学、兽医学等专业只颁发连贯一致的单级学位外,土耳其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学士^②、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学士学位四年、硕士学位两年、博士学位三年或三年以上。在通过国家或大学组织的考试之后,低一级学位可以升入高一级学位。因此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土耳其学位结构并不需要进行太大的改变。但由于学位结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三级学位,还包括学分累积与转换系统(ECTS)、课程改革及模块化等问题,因此,土耳其学位结构方面的改革依然有待深化。

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土耳其学位结构改革主要体现在:(1)2006 年开始,所有高校都必须采用学分累积与转换系统和提供文凭补充说明,所有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生都可以要求获得英语、法语、德语版的文凭补充说明,且第一次申请免费。(2)目前,由于土耳其学分制仅仅根据固定的学习时间,而不是根据学生的学习量和学习结果等对“学分”做出界定,因此土耳其的学分制还没有完全实现

与博洛尼亚进程中学分累积与转换系统的兼容。因此全国专家小组正通过为大学管理者和教职员举办专题研讨会以及培训项目等方式提高后者对 ECTS 的认识,从而实现土耳其高等教育学分制与其它国家的兼容。(3)课程改革或课程模块化也正根据博洛尼亚进程框架进行全国性的改革。比如,在“以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项目完成之后,短期高等教育(主要指副学士学位)的课程改革已基本完成。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课程改革基本没有开始,学习的弹性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等方面实施的情况令人堪忧,由此,以上改革就成为土耳其近几年博洛尼亚改革进程的工作重点。

总之,在学位结构方面,博洛尼亚进程中土耳其面临的挑战不是很大,但具体实施工作还需更加具体细致和深入。

2. 人员流动与相关资格文凭的互认

土耳其建立在大学双边协议之上教师与学生的流动已存在比较长的时间,但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生流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2003 年,土耳其启动了伊拉斯莫项目(Erasmus Programme)。由于伊拉斯莫项目的影响以及与诸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等国家签订高等教育合作双边协议的缘故,2003 年土耳其招收国际留学生占有所有学生的比例开始呈上升趋势,由 2003 年的 0.9%、2004 年的 1%、2005 年的 1.1%上升到 2006 年的 1.3%。与此相反,土耳其出国留学生在所有学生中所占比例不仅非常小,而且比例甚至呈下降趋势,2001 年和 2002 年为 2.5%,2003 年降至 2.4%,2004 年降至 2.2%,2005 年和 2006 年更是降至 1.9%。^[3]尽管其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高校招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但这也表明在促进人员流动和相关资格文凭互认方面,土耳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此,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继续加大对伊拉斯莫项目的投入外,2004 年土耳其签署加入《里斯本公约》(The Lisbon Recognition Convention)^③,2007 年正式生效执行,土耳其相关法律也根据《里斯本公约》做了相应调整。同时,各大学纷纷创建国际交流处,专门负责推进伊拉斯莫项目和为招收外国留学生提供指导,英语课程也增加了。随着 2006 年“全国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的成立及 2008 年“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工作组”(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Working Group)的成立,土耳其关于资格证书框架(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的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委员会和工作组立刻着手起草“土耳其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根据ECTS和学生学习量等为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四级学位规定了学分范围。2010年1月21日,高等教育理事会通过了“土耳其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草案,经大学院系讨论后正式施行。

尽管土耳其在推进人员流动与相关资格文凭互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土耳其关于此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此外,土耳其还面临经费、外语水平以及签证等方面的障碍,出国留学学生缺乏语言方面的技能和经费支持,无法为招收的留学生提供充足的外语类课程,等等。而且,院校层面互认工具的使用也急需改进。因此说,推进人员流动和资格文凭的互认对土耳其来说任重而道远。

3. 质量保证

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前,高等教育理事会和大学校际理事会负责全国层面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工作。高等教育理事会下属的高等教育监察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Auditing Council)负责监督高校的教学、科研及其它活动是否符合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目标与原则。大学校际委员会则主要是学术评估机构,它负责制定指导教学、科研、出版等活动的规则,对博士培养进行评估。院校层面,校长负责管理和监督大学的各项活动,以使其符合国家的发展规划。

从组织结构来看,土耳其的高等教育似乎层级、分工明确,但这些组织并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全国性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问题开始真正在土耳其受到关注。2005年,根据“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证标准和准则”,高等教育理事会制定了“高等院校学术评估与质量发展”的有关规定,就高校教学科研质量的评估与改进、管理服务、学生参与及外部评价等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创建了“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与质量改进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cademic Assess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简称质量评估委员会)。质量评估委员会根据高等教育理事会设定的目标与策略框架,决定评估与改进高校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具体程序,负责全国层面质量保障事务的协调与信息提供,同时为外部评估机构设定资质标准。

大学质量评估可采用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内部年度评估主要由各院校的学

术评估与质量改进委员会负责,它们同时也负责外部评估的准备工作。外部评估即由获得质量评估委员会认可的私立、国家或国际性外部评估机构对院校进行评估。尽管有些大学在质量评估委员会成立之前就利用诸如欧洲大学协会的院校评估计划等展开外部质量评估,但在土耳其并不普遍。相关报告和访谈显示,目前土耳其开展常规内部质量评估的院校比例不到25%,接受外部评估的院校也大概只占这个比例。^[4]

工程学院系在创建全国性认证体系中做了开创性工作。四所大学工程学院率先与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合作,获得了后者的质量认证。以此为契机,2002年土耳其所有工程学院系主任联手创建了工程认证理事会(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Council)。2007年,工程认证理事会获得了工程类培养计划外部评估执照,获得了作为外部独立质量评估机构的身份。这被认为是博洛尼亚进程中土耳其在质量保证工作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虽然有关“高等院校学术评估与质量发展”的条款也规定了学生在校内、外部评估中的参与以及保证评估结果的透明,但是,质量评估委员会主要通过强调绩效评估和质量改进以达到博洛尼亚进程提出的各项要求。同时,尽管也承认大学在质量评估过程中的权力和责任,但高等教育理事会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处于绝对主宰地位,大学自主权的作用有限。

在开发全国资格证书框架方面,2006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了“全国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委员会”,由高等教育理事会和高校代表组成。2008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了大学教师组成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工作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之间的工作没有明确界限,两者都致力于根据学习结果为所有层级的高等教育制定全国资格标准。资格证书框架也是目前土耳其博洛尼亚改革进程工作的重点。

总之,虽然土耳其在质量保障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由于土耳其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仅六七年时间,还不足以建立一种质量文化。目前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主要执行者不愿承担责任,不愿改变和不愿了解学习相关进程;缺乏经费和管理自治权;缺乏质量评估的文化或氛围;大学间缺乏竞争,等等。^[5]

4. 社会维度或教育公平

在推进高等教育社会公平方面,多年来土耳其致力于适龄青年提供更多高等教育机会,但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关注远远不够。因此,其结果是大学

数量急剧增长,第一、二级学位的毛入学率已达 45.8%,但 2009 年第一级学位的毕业率却只有 77.12%。^[6]有关学生群体多样化的数据非常少,有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代表的的数据更是难以找到。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父母从事蓝领工作的家庭子女在大学所占比例明显偏少。

招生或入学机制是提高高等教育参与公平性的重要手段。土耳其高校主要根据学生高中学业成绩以及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招生,所有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尽管单从形式来看这种招生或入学机制似乎能保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但是,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入学考试的准备过程。在土耳其,中学毕业生备战“高考”一般都需要从私立机构获得额外辅导或帮助,而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无力承受的。

另一种推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方式是为在校大学生提供足够的服务或支持。尽管土耳其基本上为其本国所有学生提供食宿、医疗补贴,且为 95% 的学生提供经费支持(其中 75% 为贷款形式),但这些只占学生教育费用的 27%^[7],其余的由学生家庭承担。学生须根据学习年限长短、学科专业等支付数额不等的学杂费用。

高等教育理事会已开始采取行动来增加残疾学生的入学机会。2006 年,有关“高校残疾学生的咨询与协调”条款正式立法通过,并成立了由高等教育理事会成员及不同大学教授组成的“残疾学生委员会”(Disabled Students Commission)负责准备相关文件,以使残疾学生的学术生活更加顺畅。

总之,由于社会维度在博洛尼亚改革总体进程中处于相对不受重视的地位,因此,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博洛尼亚进程中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或关注社会维度有更长的路要走。

5. 终身学习

长期以来,终生学习在土耳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先备学习(prior learning)的承认是推进终身学习的主要手段,可土耳其法律并不承认非正规学习。推进终身学习的另外一个手段是提供弹性学习途径,尽管土耳其远程教育已从传统由一所大学进行扩展到其它大学,但其远程教育仅针对副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为此,2009 年土耳其教育部根据欧盟有关文件出台了《终身学习战略文件与行动计划》,明确了 16 项优先行动。^[8]“第二大学”(Second University)计划允许副学士、学士学位持有者以及大学本科生不用入学考试就能申请远程教育项目。一些副学士学位

项目的对象是文职人员、残疾人以及服刊人员。同时,土耳其也提供夜校课程和在线网络课程。目前,开放教育在土耳其高等教育中已占 30%,发达国家此比例为 10%。^[9]因此说,在推进终身教育的发展中,开放教育开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上五方面的改革中,由于土耳其已有学位结构大致与博洛尼亚进程提出的改革趋势大体相同,因此学位结构的改革对土耳其来说是最容易的,这方面进一步的改革应主要集中在学习项目的实质内容方面。流动性和互认方面需要进行一些新的结构性改革。质量保障在土耳其是新生事物,尽管其整体框架结构发展比较快,但是,要培育一种质量文化则还需时日。由于对终身学习和社会维度方面改革需要的认识还不是很明晰,土耳其在这方面主要还是采用一些传统的政策措施。

二、改革进程中的组织管理

博洛尼亚改革进程中,土耳其继续其等级制的管理传统,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随着改革的深入,通过组织结构的设置以协调各方的利益表达开始日显重要。

1. 高等教育理事会(CoHE)

高等教育理事会基本上全面负责土耳其高等教育,为了处理博洛尼亚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高等教育理事会建立了数个下属机构。

2005 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了“欧盟与国际关系办公室”(European Un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作为下属机构支持高等教育理事会、各类委员会、工作小组以及高校处理与博洛尼亚进程相关的各项工作,在国家层面帮助协调国际组织(如欧洲学生会、欧洲大学协会等)与土耳其相应组织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互认、质量保障及资格证书框架等方面。同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了“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与质量改进委员会”,这是土耳其致力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典型举措。委员会根据高等教育理事会确定的目标与战略框架,决定以什么样的程序对高校学术和行政方面的服务进行评估与改进。委员会同时为外部评估机构设定资格标准,在全国层面协调质量评估。其成员由来自高校的九名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学生理事会”(National Student Council)的一名代表构成。2006 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全国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框架委员会”,由高等教育理事会和高校代表组成。

2008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创建由大学教师组成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工作小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之间的工作没有明显界限,两者都致力于根据学习结果为所有层级的高等教育制定全国资格标准。

2. 大学校际理事会

“大学校际理事会”的作用主要是负责选拔“高等教育学术评估与质量改进委员会”中高校的九名代表,除此之外在土耳其博洛尼亚进程改革中没有其它特别的任务。

3. 全国博洛尼亚专家小组

“全国博洛尼亚专家小组”(National Team of Bologna Experts)于2004年开始工作。每两年一届,处理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具体事务。小组成员由高等教育理事会从不同大学的学术人员和学生中选拔。小组的目标是推进对博洛尼亚进程中一些基本原则的理解,提高大学的参与度。为实现以上目标,小组最开始主要通过报告阐释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一些主要特征及要求。之后,小组将报告和专题研讨会结合起来,并将精力主要放在根据大学的需要为它们的改革提供各种支持上。报告和研讨会根据区域划分全国层面、地区层面和大学层面几个层次。专家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资格证书框架、质量保障以及ECTS的使用和学分互认方面。尽管专家小组的这些活动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报告和陈述主要是对博洛尼亚进程文件的翻译介绍,而不是对土耳其面临的情况展开深入分析,对必要性的陈述多于对实际操作等核心问题的关注,因此,高等教育理事会正在考虑聘用更多前博洛尼亚专家和学者充当培训者,支持目前专家小组为大学在改革过程中提供信息和支持。

4. 大学“博洛尼亚协调委员会”

2008年,高等教育理事会在每所大学建立了“博洛尼亚协调委员会”(Bologna Coordination Commission)。协调委员会负责大学层面开展博洛尼亚进程的相关改革,成员包括由大学校长任命和在有关质量保障、流动、学生事务和国际关系领域工作的人员中选拔。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包括ECTS、文凭补充说明、互认、质量保证、资格证书、学习结果、流动、学生参与以及社会维度等方面。每个协调委员会为所在大学实施博洛尼亚进程改革准备年度行动计划,就博洛尼亚进程组织专题研讨会,跟进欧洲的有关活动。

5. 国家局(National Agency)

国家局是土耳其共和国参与欧盟教育以及青年计划的中心规划组织的简称,主要参与人员流动事

务,负责与欧盟委员会和其它成员国合作实施欧盟教育与青年计划;在土耳其介绍、协调和实施欧盟教育与青年计划,并对土耳其的哪些国家项目能从中受益作出评价,等等。它同时也推进ECTS和文凭补充说明的实施,并为相关机构提供经费,比如以立项的形式为博洛尼亚专家小组提供资助。

6. 学生

博洛尼亚进程的相关文件非常强调学生理事会的作用以及学生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需要。因此,在经历了20余年^④学生组织的缺席之后,2005年高等教育理事会组织创建了“全国学生理事会”(National Student Council)和各大学学生理事会,这是土耳其致力于博洛尼亚进程的又一典型举措。理事会代表由学生选举产生,在系、院、大学以及国家层面都有学生代表。学生理事会的工作涉及教育、医疗卫生、运动与文化活动等方面事务,表达学生的诉求。大学与全国层面的学生代表可受邀列席与他们有关的各种会议。学生代表还可参加大学内部质量评价过程。但是,由于土耳其的学生理事会是高等教育理事会的下属机构而不是独立组织,因此,很难说学生积极参与了改革实施的过程。博洛尼亚进程2005年评估报告也显示,学生在地区以及国家层次会议中的参与率低是博洛尼亚推进过程的一大弱点。^[10]这一方面说明微观层面对博洛尼亚改革缺乏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学生理事会缺乏经费、行政等各方面的支持,没有投票的权利,全体学生对学生理事会缺乏认识和支持,政治对学生理事会的运作产生着影响,等等。

以上组织机构的设置显示,作为负责土耳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央机构,高等教育理事会在博洛尼亚改革进程中同样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大学更多只是执行者。尽管这种以中央为主导的做法有其好处,能保证改革的各项要求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推行,而不像西欧很多国家一样,经常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但这种单向不注重反馈的机制可能妨碍院校对改革的认同和理解,从而影响改革目标的实现。尤其在结构性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院校的作用更为重要。目前,土耳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努力进行相应的改变,主要是提供条件加强大学校际理事会、专家小组、大学协调委员会以及学生等在改革过程中的协调和参与能力。

三、结 语

博洛尼亚进程为土耳其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多新

的议题,比如质量保证、资格证书框架和学生理事会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新的机构应该是合理的。但在建设过程中,组织机构的创建被认为速度太快,以致让人怀疑这些组织机构是否能得到大学、学生和学者群体的认同,并据此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且,这还让人担心博洛尼亚进程会否会为官僚化的加强提供借口或理由。

同时,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可能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可能会让人对改革的实质缺乏了解,比如,虽然质量保证的组织架构等已建立起来,但真正实施的大学还不到四分之一。其次,也可能影响到改革进程的持续性或深入,如很多大学只关注由欧盟委员会给予的相关证明或标签^⑤,而不关注目标的实质内涵。加上目前很多改革还处在全国层面的调整期,因此要使改革内化为高校内在的长期实践,尚需时日。

缺乏财力和人力资源也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在院校层面,在财力和人力都不增加的情况下,改革意味着加重工作负担,这大大降低了院校改革的动力。

总之,在改革的组织架构已基本形成的情况下,要想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以使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目前博洛尼亚进程中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需要做的是如何调动基层即院校(包括教师和学生)的有效参与。只有大学真正成为知识生产与学术自由的主体,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引领社会”,大学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效果才能得到培养并形成^[11],从而使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注释:

- ① 其它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指军事和政治院校,因其不属于土耳其高等教育理事会(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CoHE)的管辖范围,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由于大学是土耳其高等教育机构的绝对主体,因此本文讨论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指大学。2001年,土耳其大学只有77所。
- ② 其中为期两年的副学士学位也算第一级学位。此种学位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不再升入第二级学位。
- ③ 即《欧洲高等教育资格文凭互认协议》,因1997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签署而得名。
- ④ 1980年土耳其军政府上台之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包括学生会)或被取消或受到严格限制。

- ⑤ 比如,欧洲委员会经常给大学一些有关表明它们合理使用了文凭补充说明和学分累积与互换系统的相关证明或标签。

参考文献:

- [1][4][7] WESTERHEIJDEN D, et al. The First Decade of Working o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Bologna Process Independent Assessment. Volume 2: Case Studies and Appendices [EB/OL]. [2012-04-02]. 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2010_conference/documents/IndependentAssessment_2_CasesAppendices.pdf.
- [2][6] OSYM Statistics 2010. 2000—2001 and 2008—2009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Book [OB/OL]. [2012-04-02]. www.osym.gov.tr/Genel/BelgeGoster.aspx?F6E10F8892433CFFD4AF1EF75F7A79689DAC10DE3DF29AC6.
- [3] YASEMİN YAĞCI.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Bologna Process: the Case of Turkey [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0, 45(4).
- [5][10] EDINSEL K. Bolonya Süreci'nin Türkiye'de Uygulama Projesi 2004—2005 Çalışma Raporu [Work Re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logna Process in Turkey Project, 2004—2005] [EB/OL]. [2012-04-06]. www.tsprm.org/UserFiles/File/BOPR%20CALISMA%20RAPORU%202004-05.pdf; 50.
- [8] ERDOĞAN A. Yükseköğretimde Yeniden Yapılanma: 66 Soruda Bologna Süreci Uygulamaları [Re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ologna Process Implementations in 66 Questions]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12-04-07]. <http://bologna.yok.gov.tr/files/aa47b53c5284fbbbe5d597211c0b088d.pdf>.
- [9] SARA BIN MAHFOOZ. Turke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EB/OL]. [2012-04-07]. C:\Users\wb325505\Documents\Countries\Montenegro\Articles for the Conference\TurkeysHEstratto20252Jan2007ExecSumm.doc 14/10/2009 16:56:00.
- [11] 王飞. 从外到内的制度拯救:“去行政化”与大学合法性的回归——一种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剖析[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2, (1): 68-71.

(本文责任编辑 骆四铭)